

《王勃集序》文學觀新論

錢得運

[提要] “初唐四傑”中，王勃與楊炯交誼頗深。王勃過世後，楊炯為其編集撰序。楊炯所撰《王勃集序》揭示了王勃的“文儒”特質及其文質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學觀。王勃的主要成就在於，以自己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發起對龍朔詩壇旗幟鮮明的抗爭，通過變革文風樹立起新的文學創作風貌。王勃紹承貞觀君臣的文學理想，為唐代文學的發展注入健康質素。

[關鍵詞] 《王勃集序》 王勃 楊炯 文儒 文質觀 初唐四傑

[中圖分類號] I2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7)02-0164-11

作為“四傑”之一的楊炯在為王勃文集撰序時，既對王勃的文學思想予以總結，其間亦融有楊炯自己的理念。據楊炯《王勃集序》（後簡稱“楊《序》”），王勃卒於上元三年（676）八月，謝世時年僅 28 歲。“初唐四傑”中，王、楊同齡，旨趣相近，且幼時俱有神童之名，然成人後均位居下僚。通過對楊《序》一文的解讀，可以大體了解王勃文學觀念產生的背景，王勃的文學成就以及對當時文壇的重要影響。

一、王楊交誼

關於王勃與楊炯的交誼，楊《序》言其與王勃“投分相期”，說明兩人交情頗深。張志烈《王勃雜考》“王楊的交誼”一節，在聞一多《唐詩雜論·四傑》的基礎上，認為除《山亭興序》、《秋日餞別序》外，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中的友人，亦指楊炯。王勃在乾封二年曾與楊炯一起在楊炯的老家華陰住過，《山亭興序》即作於此時。之後不久，王勃又寫了《山亭思友人序》、《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等文，從中可以看出兩位同齡人的相契相知及充滿青春向上氣息的昂揚情態。張志烈認為在王勃入沛王府前，兩人已經相處歡洽，蓋因二人同處京師，皆有文名。^①誠如楊《序》所載，薛元超既與王勃有通家之好，同時又對楊炯有舉薦之恩，明乎此，則可進一步推測王、楊在龍朔年間就有交往的可能。

王、楊在詩文創作上有交流、也有較量。楊炯與王勃同題之作《青苔賦》，楊賦以騷句為主而雜以其他多種句式，王賦為傳統六朝駢賦，整齊的四六句式。馬積高《賦史》云：“王勃亦有同題之作，篇幅僅及楊作之半，其結語云：‘恥桃李之暫芳，笑蘭桂之非永，故頓時而不競，每

秉幽而自整。’兩相比較，覺楊炯此作，在命意剪裁兩方面又都在其下了。”^②王勃撰有《益州夫子廟碑》，楊炯亦有《大唐益州大都督府縣學先聖廟堂碑文》、《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據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楊炯均後於王勃而作。王、楊的文學創作雖然各有側重，各具其長，但是他們的審美理念大體相近，因此他們對當時文壇風貌的見解也大體相同。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③“翰苑”、“文場”，均見用於楊《序》。楊炯與王勃一樣，皆傲視今古，以不凡的氣概表達其文學見解，並對龍朔詩壇的不良風貌進行矯正。

關於王勃文集的編輯情況，楊《序》云：“究而序之，分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都》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可知在王勃生前，未予編集撰序。日本唐鈔本《王勃集》卷三十存王紹宗（承烈）文三篇。其中王紹宗《與王勃書》所署寫作時間為：“乙亥年仲秋月廿有九日。”王紹宗又寫兩封信給王勳，其中一篇提到王勃去世的消息。王紹宗沉痛地說：“若三弟苗場萎葉，芝圃摧英。楊童結歡於郛根，顏子慟心於闕里。良可惜也，何痛如之。”^④王紹宗作文祭王勃，時“文明元年八月廿四日”。^⑤日本唐鈔本《王勃集》卷三十有編者附語，對此考證說：“君適交州日，路經揚府，族翁承烈有書與君，竟未達。及君沒後，兄勳於翁處求此書，承烈有書與勳，兼送舊書，今並載焉。”^⑥由是可知，上元二年（675）王勃南行至揚州，族翁王紹宗寄以書信，惜未達。王紹宗與王勳兩封信及《祭王勃文》，均作於文明元年（684）八月廿四日，時距王勃過世已有七年。王紹宗《重與王勳書》關心王勃文章著述情況，云：“不知文筆總數幾許，更復緝注何書？小史往還，時望寫錄。豈唯自擬賞玩，兼欲傳之其人。”^⑦可見王氏兄弟已對王勃的文集及相關著述進行整理。由此大致斷定，王勳兄弟搜求王勃遺文並編輯王勃文集以及楊炯撰寫《序》作之事，在文明元年或稍後。假使楊炯於文明元年撰寫序文的話，距王勃過世已逾八年。而此時楊炯更能客觀、深入地評價王勃的文學成就以及在文壇上的功績。

二、王勃的“文儒”特質及其文質觀

楊《序》開篇即云：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滋久，遞為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沒，遊、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⑧

“文儒”一詞，較早出現於《論衡·效力篇》：“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⑨王勃《上明員外啟》對此亦有引用：“髦頭傑起，文儒繼出。”^⑩唐人對“文儒”的理解則與王充的解釋有所不同。如陳子昂《周故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懸尉陳君碩人墓誌銘》稱墓主人陳該為“文儒”，並言其“少好學，能屬文。”^⑪又，陳子昂《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並序》：“偃武橐弓，借爾文儒之首”，^⑫稱崔融為文儒。由此可知，“文儒”一詞分開來講，文側重於“屬文”，而儒則偏向於“好學”。如果稍做引申，《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天寶敕》云：“其前資及白身人中，有儒學博通及文詞透逸……具以名薦。”^⑬此處“儒學博通及文詞透逸”可以視作唐人對於“文儒”最為貼切的理解。楊《序》提及“文儒”，實際上就是將王勃作為具有“文儒”特質的人來看。

王勃的“文儒”特質有其家學淵源：

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聞風睹奧，起予道唯；摧摩三古，開闡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

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讚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而歿。

王通對王勃影響很大。王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其生平事蹟具見其門人薛收所撰《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薛收，即“薛令公”薛元超之父。楊《序》云：“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眾序。包舉藝文，克融前烈。”^④現存《王子安集》除《續書序》外，其餘均佚。《續書序》云：“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又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利，前人之不斷是懼。”^⑤王勃《續書序》稱其祖父王通：“約大義，刪舊章，《續詩》為三百六十篇，考偽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為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⑥

王勃對於以儒名世的家聲非常自豪，其於《送劫赴太學序》云：“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吾被服家業，霑濡庭訓，切磋琢磨，戰兢惕厲者，二十餘載矣。”^⑦又於《倬彼我系》自述世系，稱其祖父王通：“其位雖屈，其言可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並表達他對祖德繼承的願望：“思屏人事，克終前烈。”^⑧王勃《上明員外啟》亦云：“祖德家聲，代有縱橫之目。”^⑨王勃有著承繼祖德家聲的使命，也著力於傳承和流播祖父王通的學術思想。楊《序》記載王通的內容相對較多，由此可以看出楊炯的用心：通過對王勃家學淵源及其思想背景的交待，揭櫫王勃的“文儒”特質。

王勃“文儒”特質亦體現在其著述上：

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成乎期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才數百篇。……究而序之，分為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都》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在經歷過沛王府鬥雞被斥事件及曹達牽連事件之後，王勃“坐廢於時”、“不合於朝”，而“著撰之志，自此居多”。王勃雖享年僅二十八歲，然著述頗富，撰有：《漢書指瑕》十卷、《合論》十篇、注《周易》（未竟）、注《黃帝八十一難》，《次論語》、注周易（即《周易發揮》）等。《舊唐書·王勃傳》云：“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語》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⑩《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王勃《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雖然這些著述均已亡佚，猶可見王勃的家學淵源與學術素養，體現出了王勃的“文儒”特質，而這必然影響到其文質觀。

《序》文開篇“天文”、“人文”之論，源自《易·賁卦·彖傳》。王勃《平臺秘略論·藝文》亦云：“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⑪

楊《序》開篇鋪陳“文”義，由“天地之文”歸於“人文”，進而聯結到“立言”上，進而表達對文學重要性的體認。楊炯將文學分為兩途，一是體現儒家思想的側重於“質”的創作；一是表現文學藝術的側重於“文”的創作。楊《序》云：“歷年滋久，遞為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蔣清翊釋引李善《文選注》所引《春秋元命包》釋“文質”：“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②在唐人看來，文與質作為兩種形態，其離合軌跡正是文學得以發展變化的原因。因此在特定的時代，就需對其進行重新的審視整合。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勃幼乏逸才，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闐闐。觀質文之否泰眾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③王勃將文、質予以調適，使文與質“因運”而得以“通粹”。王勃的文質觀在其文學思想中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注重以剛雄質直之氣挽頹靡雕琢的文風；二是強調文章既要有藝術文采，也要貫道濟義。

楊《序》文末有云：“君以摘藻雕章，研幾之餘事；知往藏來，探蹟之所宗”，即表明王勃不以詩文創作為業，更主要的還是在於著述。由此不難理解，楊《序》以很大篇幅提及王勃承繼祖父王通的儒家學術及其本人的著述情況，可以作為王勃“儒”之特質的證明；而王勃“文”的一面，則通過其文學理論及文學創作予以展現。王勃的文學理論以及作品的淑世之道，與其“儒”的特質有很大關係。葛曉音認為王勃“不但文章宏麗，而且以繼承王通續儒家經典的事業自任”，是初唐兼通文儒的典型。^④由此可知“文儒”既是對王勃最為確切的評價，也是楊炯作此《序》文的基調。

三、楊《序》的文學史觀

《序》文的文學史觀主要體現為對前朝文學的批評：

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儷俛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群材，周、隋眾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

對於文學的歷史演變，楊《序》認為文質交復之道正是文學遞變之因，故以此批判性的態度對前朝文學進行評價。在此，我們不妨看王勃對前朝的文學觀念，其《上吏部裴侍郎啟》云：“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鶩，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上周陳之禍。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⑤由此可知，王勃對於前朝文學基本上持貶斥的態度。如果再稍作考察，王勃祖父王通《中說·事君》有一段論及前朝文學：“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人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人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誇人也，其文誕。或問孝先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⑥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從人品與文品相結合的角度對前朝的作家予以評價。他所肯定的人物，如王儉、任昉都是以儒術經學名世的。因此王通在文學觀念上強調文學的政教作用。

可以說，王勃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其祖父的文學思想，那麼，這就與《序》文所論不盡相合。

一般而言，撰序人與集作者之間有交誼，並且文學理念和風格大體相近。因是之故，楊《序》所敘關於唐前的文學觀念以及其與王、楊所處之世的文壇風貌，將集作者的文學思想較為集中而精略地表達出來，當然也不妨礙撰序人抒發自己的見解。如此，這一段評論便融有楊炯本人的見解。

《序》文強調文學創作要“盡力於丘墳”、“尋源於禮樂”，認為此乃“質”素，可以補“文”之不足，實際上就是突出文學作品的政教功能，而這正是“文儒”所具有的特徵。在這一點上，楊炯還是將其與王勃的文學觀念牽合起來。此外，在批評文學創作中，針對當時“守律以自全”，而不能“非常而制物”萎靡風氣時，王、楊觀點是一致的，都有變革文風的強烈願望。

四、王勃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

王勃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即以自身文學創作為前導，對當時的龍朔詩風進行抨擊，力圖通過掃蕩文場風氣，形成一種新的創作風貌。

（一）文學成就

其有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經籍為心，得王、何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驤首，馳光芒而動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

王勃既鑒前朝文學演進之弊，又評近來龍朔詩風新變之失，以其傑出的識見和非凡的創作，“變化成一家之體”。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經籍為心”，強調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從中汲取思想和藝術的養料。“王、何”，分別指王弼、何晏，他們以著述傳世。《三國志·魏書·鍾會傳》云：“（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②《三國志·魏書·何晏傳》云：“（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③由此可以看出，在年少才秀上，王勃與王弼、何晏二人有很多相似處。

其二，“風雲入思”，指山川感召的經歷對詩文創作的影響。“張、左”，指張載、張協與張亢兄弟和左思。《晉書·張載傳》云：“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④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張載：“孟陽長於言愁，觸緒哀生，空湧不能自止。筆頗古質，不落建安以後”^⑤；評張協：“景陽揮灑匠心，縱橫盡情。”^⑥《晉書·左思傳》稱其“辭藻壯麗”。左思名作《三都賦》，劉逵稱其：“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核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衛權則云：“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庶類，稟之圖籍；辭義瑰瑋，良可貴也。”^⑦《文心雕龍·才略》云：“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⑧左思作品的文風壯麗雄豪，沈德潛評曰：“太沖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⑨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曰：“太沖一代偉人，胸次浩落灑然，流詠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簡貴。創成一體，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⑩所謂“叶張、左於神交”，即注重張、左詩歌所具有的雄邁氣象，而這種風格尤其體現在王勃自斥出沛王府後，出遊入蜀，受山川感召而創作的詩文上。

其三，“文駕班揚，學窮遷董”，^⑪將文與學（儒）結合起來，成為王勃文學創作的一大特徵。以上所列前兩點，前者可以說是儒，而後者則是文，正好體現了王勃的“文儒”特質。基於對龍

朔詩風的批判，王勃重視文學創作的政教功用，同時注重拓展視野，“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①王勃《入蜀紀行詩序》云：“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遊涓澮者發江湖之思。足踐靈區，煙霞為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②蜀地山川的遊歷，使王勃的才情更顯宏闊昂揚，陽剛勁健。

王勃追求詩文的雄壯之美，其於《山亭思友人序》云：“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③他對這種雄壯之美多有表述，如其《遊冀州韓家園序》云：“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④又，《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云：“雄筆壯詞，煙霞照灼。”^⑤又，《夏日宴張二林亭序》云：“雄筆清詞，得高陽之意氣。”^⑥再如《平臺秘略讚·藝文》所云：“氣陵雲漢，字挾風霜。”^⑦在這裡，“氣者，指耿耿之風情。氣凌霄漢，氣橫霜暑，皆言感情之昂揚激越。挾風霜者，指剛勁之氣，也是此意。他所追求的，是一種表現濃烈壯大高揚的感情的文學”。^⑧

（二）掃蕩文壇，思革其弊

1. 對龍朔詩壇的批評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

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王志烈《王勃雜考》一文認為龍朔初載當是龍朔二年（662）。龍朔初載的“文場變體”，“實際上包括‘上官體’和許敬宗‘頌體’詩文兩種創作傾向，而且他們具有共同的藝術特徵——‘骨氣都盡，剛健不聞’”，^⑨代表人物有上官儀、李義府、許敬宗等人。《舊唐書·李弘傳》云：“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⑩又，《新唐書·藝文志四》在“《芳林要覽》三百卷”下注：“許敬宗、顧胤、許圜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姚璿、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⑪龍朔二年左右，郭瑜撰《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歌錄集》八卷，孟利貞撰集《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這些總集、類書的編纂，與當時興起的上官體為代表的詩壇風尚基本一致。以這些主要人物的生卒年來看，上官儀早在麟德元年（664）伏誅，而許敬宗卒於咸亨三年（672）。如果以主要人物的消歇為據的話，那麼龍朔詩風的沿續則有十年之久。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云：“余以龍朔元年，為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禕之、典簽范履冰。時東閣已建，期竟撰成此錄。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宿志。……余於是以前情為先，直置為本；以物色留後，綺錯為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窮之以形似，開之以振躍。或事理俱愜，詞調雙舉。有一於此，罔或子遺。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為始，至上官儀為終，刊定已詳，繕寫斯畢，實欲傳之好事，冀知音。”^⑫元兢的詩歌理念與龍朔詩風相近。自龍朔元年開始，元兢用了十年時間編成《古今詩人秀句》，所選秀句止於上官儀。由此可知，“上官體”或以上官儀為首的龍朔詩風在當時文壇有很大的影響，並未因上官儀的伏誅而頓然消歇。

上官儀憑藉其貴顯之位及文學才華在文壇上獨領風騷，《舊唐書·上官儀傳》云：“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宦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

當代所嫉。”^④龍朔年間，上官儀等人不僅有詩歌創作，還有理論著述。龍朔二年或稍前，上官儀撰有《筆札華梁》二卷，論述作詩之法，詩歌的對偶及病犯，如“六對”、“八對”之說。《序》文所謂“影帶”，即指“映帶體”。《文鏡秘府論·地卷·十體》云：“映帶體者，謂以事意相愜，複而用之者是。”^⑤這是一種雙關手法，自南朝至初唐人多有使用，易流於纖巧。映帶手法，在上官儀詩中經常用到，而假對手法則常見於上官儀和許敬宗詩中。

盧照鄰評價唐初貞觀君臣創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途；既博既精，為學遍遊於百氏。”^⑥王勃的“文儒”特質與貞觀君臣相近，從此角度來講，王勃繼承了貞觀君臣倡導的文學理念。而許敬宗、李義府等以科舉入仕的大臣，“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奸。”^⑦與貞觀君臣相比，他們“事君不是以儒家之道，而是以一己之私利”，且“龍朔文士群體普遍具有尚文輕儒、急於干進、利慾薰心、無儒雅之態，無骨鯁之氣的人格特徵。而這些人格特徵和文化質素又影響了他們的藝術審美觀和詩歌創作思想，使他們有意識地對貞觀詩風進行‘變體’”。^⑧

“爭構纖微，競為雕刻”，與“苟求蟲篆”、“綺錯婉媚”之意相近，這是對龍朔詩風的準確概括。這種文壇“變體”，實際上背離了唐初君臣所提倡的合南北文風的主張，也與貞觀君臣創作的一些剛健詩作不同，故而雖然稱之為“變”，只是在詩歌的聲律、對仗等表現技巧上更趨精緻而已。王勃“思革其弊”，承續貞觀君臣所宣揚的詩歌理念，在詩文創作與理論上均予以強烈回擊。

2. 矯正俗流，反諸宏博

王勃在批評龍朔詩壇的文學理論的同時，建立新的文學標準：

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鑿，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為資。長風一振，眾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績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

龍朔年間的“文場變體”，主要體現在對詩歌聲調格律、辭藻的追求上，講求雕琢纖巧，富麗穠豔的風格，偏於綺碎、紛績，略無剛健氣象。因此，王勃首先要做的，就是“動搖文律”，即詩歌創作上注重聲律節奏。胡應麟《詩藪》云：“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婉然，氣骨蒼然，實首啟盛、中妙境。五言絕亦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唐人開山祖。拾遺、吏部，並極虛懷，非溢美也。”^⑨同時，要“沃蕩詞源”，將豐富的學識儲備靈活自由地運用到詩文創作上。另外，文章創作要“鼓舞其心”，需要作者具備豐富的情思。當然，作品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還需要節制，不能一味地追求縱橫之氣、鼓怒之態。要之，王勃則提倡雄伯、宏博的詩歌風貌，具體來講，就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即以充實剛健的文風來糾正龍朔詩風的綺碎纖巧之弊。

（三）文學影響

1. 知音與之，知己從之

王勃在創作上展現出新的文學風範，在理論上對龍朔詩壇予以強有力的反對，得到時人的贊同和響應。

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

王勃對龍朔年間的詩風持貶抑批評的態度，將其體現在文學理念和詩文創作上，得到了前輩薛元超、盧照鄰，同輩楊炯等人，以及一批後進之士的積極回應。

薛元超，即薛收之子。薛收為王通門人，楊《序》所云“托末契”，即指此。王勃《秋夜於綿州群官席別薛昇華序》云：“分有一面之深，而非累葉之契。故與夫昇華者其異乎！嗟乎，積潘、楊之遠好，同河、汾之靈液。”^⑤薛曜，字昇華，薛元超子，故王勃稱“累葉之契”，蔣清翊釋云：“文云潘、楊遠好，蓋又兼姻戚矣。”薛元超不僅具有文學才能，又善於引薦後進之士，為當時所稱。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云：“公賦《征西詩》一首，上稱善嗟歎者久之，因代英王屬和，御筆繕寫，朝以為榮。公有屬詞之美也，不亦文乎？黃門侍郎上疏薦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徹、孟利貞等，後皆有重名，歷清貴。及兼左庶子，又表鄭祖元、沈伯義、賀覬、鄧元捷、顏強學、崔融等十人為學士，天下服其知人。……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⑥楊炯也是為薛元超所稱賞並引薦的人物，《新唐書·楊炯傳》載：“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⑦值得注意的是，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云：“歲餘，上官儀伏誅，坐詞翰往來，徙居越嶲。”^⑧薛元超與上官儀頗有交往，且因上官儀事而受累遠謫，但他並不贊成“上官體”，並對後輩王勃等人的詩風改革予以鼓勵。

咸亨元年，王勃與盧照鄰在蜀地初次相會。盧照鄰年長王勃近二十歲，甫一交接，即對這位年屆二十的青年才俊的超凡才華流露出欽佩之情。楊《序》說盧照鄰“覽清規而輟九攻”，指王勃入蜀與盧照鄰詩文酬唱之時，其詩文才華得到盧照鄰的歎賞。《盧照鄰集》卷三有《三月曲水宴得樽字》詩後，附王勃同題詩；九月，王、盧等人同遊玄武山，登高賦詩，《盧照鄰集》卷三有《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後附王勃、邵大震同題詩作。關於王勃與盧照鄰的交誼，據祝尚書《盧照鄰年譜》考證，咸亨元年（670）王勃在蜀地，三月，與邵大震、盧照鄰修曲水禊，有詩唱和。^⑨

王勃對“龍朔詩風”予以批評，薛元超與盧照鄰是“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薛元超與盧照鄰都年長於王勃，薛元超作為與王勃有通家之好的長者，對後輩提攜鼓勵；而盧照鄰則與王勃詩歌唱和，有詩文上的切磋交流。

2. 後進之士，翕然景慕

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回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莊思之雄宗也。

妙異之徒，別為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容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節，已滯心而忘返。乃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同，非墨翟之過；重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既知之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

王勃的詩文創作迥出時輩，為當時文壇注入了新鮮活力，並得到一大批人的肯定與學習。這些後進之士長期處在以雕琢為尚、精研格律對仗的風氣下，缺乏富有活力與個性的創作，而王勃

的才情之作，正好是他們突破這種束縛的榜樣，於是群起而學之。然而當時亦有學習王勃而出現畫鵝類鶩的現象，楊《序》對此亦予以批評。他評價這些“妙異之徒”著力於求“妙”，即：“長句以增其滯，客氣以廣其靈。”此處“客氣”，類似《史通·雜說》所云：“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⑩所謂“客氣”，指文章虛誇浮泛。由此看出這些後進之士在文章寫作上喜歡運用長句的形式來達到文風的“奔放”雄壯，結果失於節制，反使文氣呆滯；在文章上追求靈動的效果，但又陷於虛誇浮泛；在求“異”上，“別為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

王勃文章氣勢雄偉，場面宏壯，遣詞用句，誠如楊《序》所云：“河海無息肩之地”，“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如王勃《山亭興序》云：“長松茂伯，鑿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風塵灑落，真上天地九萬里；丘墟雄壯，傍吞少華五千仞。”^⑪再如其《遊山廟序》、《山亭思友人序》等文章，以雄筆壯詞，帶給人強烈的震撼。王勃《益州夫子廟碑》稱自己：“幼乏逸才，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閭闕。”^⑫王勃在創作上不以逞才為強，反對徒以“縱橫取勢”、“鼓怒為資”，而是將文與學結合起來。然而模仿他的“妙異之徒”，缺乏通脫之才，在創作上趨於另一極端，究其原因：一是“罕識其源”，即在文章表相上用功，缺乏豐富的學識儲備；二是務為奔放，不懂節制，因沿循辭義而陷於模式化效仿，缺乏通脫才能。

結 論

楊《序》敘述王勃平生，其發言立論，“暢論破塞胸之疑，尚友知己”。^⑬而楊《序》本身也是“巨篇回薄，骨肉騰飛，不得專目之為藻艷”^⑭的雄文，從中可以看出楊炯的文學才華及文學思想。楊《序》對王勃的人生履歷、家世背景以及文學功績等作了詳盡說明，揭示出王勃文學觀的重要特徵：

一是王勃的“文儒”特質，這既是王勃家世學術淵源的表徵，也是其文學思想的重要支點。王勃的“文儒”特質體現在文學觀念上，認為文學應當貫道濟義，注重政治功用。這既是對貞觀君臣文學規劃在思想上的接續，也是對龍朔文士群體人格特徵、藝術精神缺陷的駁正。同時，王勃注重學識素養，以豐富的學識作為文學創作的根基，這些“質實”的思想對偏於文采技藝的創作風氣有明顯的矯正作用。

二是對龍朔詩壇的批評。前引楊《序》所謂“積年綺碎”，指龍朔詩風在上官儀後依然流行；而“一朝清廓”，固然有著楊炯對於王勃為文壇吹入新風，矯正龍朔詩風之弊，使詩文創作走向宏博雄邁的褒獎，但這種行為並非一朝一夕之功。龍朔初年“上官體”流行時，王勃年僅十四歲，從《上劉右相書》僅能看到他學術根基、超凡識見以及出眾文采，但尚未體現出其文學觀念以及對當時文壇的見解。然通過王勃《平臺秘略論（讚）》、《山亭興序》等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其詩美追求及詩歌理想與龍朔文壇大為不同。王勃對當時文壇的“清廓”之功，應當發生在王勃自蜀歸來之後。王勃自總章二年（669）入蜀，至咸亨二年（671）歸京參加時選。王勃的入蜀經歷，對其文學創作而言，誠可謂“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而其“著撰之志，自此居多”，則是發生在虢州參軍任後。因此，真正對龍朔詩風進行大力矯正並產生重大影響，應當就是咸亨二年“四傑”之名^⑮在為時人稱道，並在其赴京參選以及曹奴事件發生前後的這段時期。在這一場在野的位卑之士對在朝的文士群體的抗衡中，王勃等人取得了勝利。

王勃以其卓絕才華在初唐文壇上大放異彩，宜乎“勃文為四傑之冠”^⑥的美評。《新唐書·文藝傳》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絳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⑦據《新唐書》的觀點，唐代文學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變化，主要得益於王勃、楊炯等人在理論與創作的變革創新。王勃紹承貞觀君臣的文學理念，通過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反駁當時的不良文風，為唐代文學的發展注入健康質素。

①張志烈認為龍朔二年薛元超被徵為右成務回朝。同年，楊炯待制弘文館，並得到薛元超賞識。據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龍朔元年冬王勃隨曹元在長安學《周易》及醫學，龍朔二年時尚在長安。故王、楊二人可能在龍朔年間就有交誼。參見張志烈：《王勃雜考》，成都：《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②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7頁。

③⑬⑯⑳㉑㉒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4、277~278、277、274、264、272頁。

④⑥⑦王紹宗：《重與王勵書》，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66、265、266頁。

⑤⑧王紹宗：《祭王勃文》，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二二，第266頁。

⑧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首，第61頁。本文所引楊炯《王勃集序》，用楷體標出部分，均出自“卷首”第61~77頁，不一一出注。

⑨王充著、張宗祥校注：《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4頁。

⑩⑰㉓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四，第138、138、130頁。

⑪徐鵬校點：《陳子昂集》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35頁。

⑫徐鵬校點：《陳子昂集》卷二，第41頁。

⑬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1頁。

⑭㉔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首，第75、61頁。

⑰④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八，第252、257頁。

⑱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三，第

66~67頁。

⑳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006頁。

㉑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十一，第302頁。

㉒④⑥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十五，第457、428、457頁。

㉓葛曉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復古思潮的濫觴》，《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6頁。

㉔張沛：《中說校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9頁。

㉕陳壽撰：《三國志》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795頁。

㉖陳壽撰：《三國志·魏書·何晏傳》卷九，第292頁。

㉗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525頁。

㉘⑩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1、353頁。

㉙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二《文苑傳》，第2376頁。

㉚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700頁。

㉛沈德潛選：《古詩源》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63頁。

㉜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一，第344頁。

㉝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頁。

㉞④⑥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七，第227、223、217頁。

㉟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3頁。

㊱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

- ④⑥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八六，第2828頁。
- ④⑦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六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21頁。
- ④⑧⑩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555、449頁。
《文鏡秘府論·南·集論》此部分內容，研究者普遍認為是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
- ④⑨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八〇，第2743頁。
- ④⑪盧照鄰：《南陽公集序》，見盧照鄰著、祝尚書注：《盧照鄰集箋注》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7頁。
- ④⑫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李義府傳》，第2772頁。
- ④⑬杜曉勤：《論龍朔初載的詩風新變》，北京：《文學遺產》，1994年第6期。
- ④⑭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7頁。
- ④⑮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一九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87頁上。《舊唐書·薛元超傳》（《舊唐書》卷七三，第2590頁）亦云：“元超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
- ④⑯⑰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二〇一，第5741、5725頁。
- ④⑱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一九六，第1985頁下。
- ④⑲盧照鄰著、祝尚書箋注：《盧照鄰集箋注》附錄四。
- ④⑳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卷

- 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7頁。
- ④㉓④國家圖書館藏《初唐四子集·王子安集》批語輯錄明人張燮語，轉引自陳於全：《楊炯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0、180頁。
- ④㉔“四傑”並稱始於何時，學術界看法不同：劉開揚《論初唐四傑及其詩》（濟南：《文史哲》，1957年第8期）認為是在唐高宗龍朔至麟德年間（661～666）；何林天《初唐四傑之稱始於何時》（北京：《人民日報》，1983年5月24日）通過推薦四傑於裴行儉的李敬玄的相關事蹟，認為四傑之稱始於麟德二年（665）；李厚培《初唐四傑之稱始於咸亨中》（貴陽：《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11期）與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均認為是在唐高宗咸亨年間（670～674）；田媛《“初唐四傑”的並稱與排名》（北京：《文史知識》，2006年第12期）認為四傑並稱在乾封年間最為可能，即在總章二年（669）王勃入蜀前。綜合諸家之說，本文傾向於四傑之名形成於王勃入蜀至咸亨二年入京前的一段時期。
- ④㉕永瑨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77頁下。

作者簡介：錢得運，蘭州理工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蘭州 730050

[責任編輯 桑海]